

大众的教授

Prakash Loungani对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采访

“全美国最被误解的人”——这是2009年美国《新闻周刊》的一篇文章中对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评价。该杂志称，这位2001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得主“无法在家门口获得尊重”，并且“华盛顿当局仅将其视为又一位经济批评家，而且总是不受欢迎的那一位”。然而在他的祖国——美国之外，斯蒂格利茨的境遇却大不相同，在许多国家他就像一位先知。幸运的是，这段日子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有相当多的时间在美国之外：“我的护照本是如此之厚，以至于有时我会怀疑它是不是真的。”

对他在华盛顿的不受欢迎，斯蒂格利茨并不感到意外。他说这是因为他总是站在弱势的一方，反对那些金融界的精英和他们的拥护者。这一思想贯穿他一生的工作。为他赢得诺贝尔奖的学术

著作聚焦于交易中一方的信息少于另一方的情况，而这导致市场常常出现明显的不公平现象。20世纪90年代斯蒂格利茨开始投身于政策制定，首先就职于克林顿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CEA），之后成为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他不停地同“律师、投资银行家和超级经济大国”较量，以捍卫世界公民的目标。正如10年前乔纳森·凯特在其《美国前景》中所言，斯蒂格利茨“依旧是个教授，而非演员……可不知为什么，他所关心的议题几乎总是能成功地被提上议事日程”。

学者约瑟夫

斯蒂格利茨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长大，这里也是另外一个诺奖得主



保罗·萨缪尔森的家乡。从小他的父母就向他灌输“行事光明磊落”的思想。他的母亲在一所公立学校教书，是一位非洲裔学生占绝大多数的学校的白人老师。他的父亲告诉他为家政工人支付社会保障金在道德和法律上的重要性——斯蒂格利茨说他父亲的教诲使他在作为CEA主席“出席参议院听证会时避免了许多麻烦”。他还深情地回忆起他的一位叔叔，后者尽管是位成功的商人，却批评肯尼迪总统过于压制工会。

高中的一次人格测试结果显示，斯蒂格利茨有资质成为一位优秀的学者。他起初并未沿着这一方向发展，但在他完成本科学业的Amherst大学，斯蒂格利茨很快因作为令人钦佩的辩手和阐述者而名声鹊起。期间他还做了一个改变命运的决定，那就是将自己的专业由物理学转向经济学，而他在后者上的惊人天赋很快就展露无疑。巴里·纳尔巴夫是耶鲁大学教授以及斯蒂格利茨的合作者，他是这样评价的：“就像犹太教拉比·希勒尔，约瑟夫能够做到一方面解释你想要知

道的经济学理论，另一方面对这些理论进行评论。”

了解到斯蒂格利茨的潜力，他的教授们在他大三结束时鼓励他离开Amherst，到其他地方开始研究生学业，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对他的离去万分惋惜。“坦率地说，看见斯蒂格利茨离开就像目睹一个人失去右臂”，其中的一位教授这样说。但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却因为有了这个学生而喜出望外。MIT的招生委员会将他的信息传给了该校经济系，并询问应该给他多少奖学金，列出的选项从没有奖学金到12000美元。评估斯蒂格利茨申请的教授在文件夹上信笔一挥：“给他系主任的薪水。”

论文高产者

斯蒂格利茨到MIT几周之后就完成了他的第一篇学术论文。这篇于1965年发表的论文（当时斯蒂格利茨22岁）挑战了卡尔·马克思的论断，即在后者所在的年代，欧洲各国需要殖民地为其本国货物的过度生产提供市场。斯蒂格利茨认为殖民地更重要的作用是提

供发现投资机会的途径，没有了殖民地，企业家可能将耗尽本国的高盈利机会。殖民主义是创造那些与外国投资安全性相关的财富权的一种途径。而更重要的是，殖民者可以为殖民地的投资指明方向，从而避免与本国产业相互竞争，例如英国就始终不让印度投资纺织行业。该论文是斯蒂格利茨同情经济上相对贫困国家的早期体现，这也是导致他如今反对富国给予其富裕的农场主农业补贴的原因，这种行为抑制了来自世界上各个穷国的农民的竞争。

“斯蒂格利茨‘依旧是个教授，而非演员……可不知为什么，他所关心的议题几乎总是能成功地被提上议程’。”

20世纪60年代，MIT是经济学革命的中心。“该经济系将数学——而不是哲学或意识形态——置于政策分析的中心”，斯蒂格利茨这样说，但MIT力图做到“使精心构建的数学模型和经济世界的实际问题相协调”。斯蒂格利茨继续在此项工作上显示他的卓越才华，成果之多，以至于他刚毕业MIT就给了他一份教职。但这个工作还有附加条件。斯蒂格利茨不得不答应睡在公寓而非他的办公室中——MIT想要看到一份租约，以证明他拥有公寓——并且不得不开始在办公室中穿上鞋子。MIT无法长久留下斯蒂格利茨，之后的20年他的足迹遍布剑桥、耶鲁、牛津、斯坦福和普林斯顿，但MIT对他潜力的判断是正确的。斯蒂格利茨发表的一项高水平学术成果为他赢得了1979年的克拉克奖，该奖授予40岁以下的具有重要影响的美国经济学家。而他获得诺贝尔奖也只是时间问题。

在一份列出经济学中最重要的文章的名单中，斯蒂格利茨有6篇论文在列，与之比肩的只有罗伯特·巴罗和尤金·法玛。他论文中的共同主题是：在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或交易各方的信息不对称时，市场很难合理地运作。

在1981年与安德鲁·维希合著的论文中，斯蒂格利茨有力地证明了在这种情况下发生时，信贷市场是如何错误运作的。根据教科书中的信贷市场模型，利率将带来需求和供给的平衡。如果信贷的需求相对于供给过剩，利率将上升，从而减少某些借贷人的需求。但是，如果贷款人不知道其借款人中哪些将努力完成项目并偿还贷款，又有哪些将推诿塞责，并仅仅寄望于好运气助其清偿贷款，情况又会如何？如果存在信贷的过度需求，利率的提升将令那些努力工作的借款

人失去信心，但这并不影响那些意欲就贷款进行赌博的借款人。因此，与教科书上的模型中供给与需求间重建平衡大相径庭的是，利率的上升事实上将以借款人的构成转向贷款人不愿见到的类型而告终。纳尔巴夫说斯蒂格利茨和维斯的论文体现了“那些你停止向其放贷的人，或者导致你变动贷款利率的行为……或者，如小丑葛罗卓可能会说的：‘我不愿借钱给任何会在这个利率下借贷的人’。”通过阐释为何借贷人会设置信贷额度，即对贷款额作出限制，而非提高利率，斯蒂格利茨和维斯的论文对信贷市场进行了更现实的描述。

在其他论文中，斯蒂格利茨表明此种信息差距同样可能扰乱劳动力市场。在教科书上的模型中，工资率是杠杆，通过上升或下降来平衡劳动力市场的供求。但是，正如信用市场那样，信息的不完备同样存在。雇主通常缺乏关于哪些雇员会全力以赴地工作，又有哪些雇员可能会开小差的准确信息。这些雇主当然可以监控他们的员工，以确定谁在努力工作，谁又是只说不做。不过，这种监控相当耗费雇主的时间，并会降低雇员的士气。

斯蒂格利茨认为，雇主因此有可能将工资率用于区分工人是否在开小差。他们可能提供比市场率更高的工资，作为对那些愿意并且能够努力工作的人的激励。提供比竞争条件下更高的工资意味着：如果失去这份工作的话，好的工人将有所损失；因此，他们有动力去努力工作。但一旦设置高于竞争水平的工资，工资率将不再成为消除失业的杠杆。事实上，正如斯蒂格利茨在1984年与卡尔·夏皮罗合著的论文中所证明的，在作为防止工人开小差的“约束手段”的意义上，失业是必要的。

斯蒂格利茨同样质疑：在获取信息的成本高昂时，股票市场如何能够运转良好。教科书中股票市场模型的假设是股价准确反映了所有公开可得的信息。但在1980年与桑迪·格罗斯曼合著的论文中，斯蒂格利茨指出了矛盾之处。如果股价完美地反映了所有市场信息，那么没有人会费心收集信息，因为人们会从股价中免费获得这些信息。但如果没有人用心收集信息，那么价格将无法反映信息。纳尔巴夫说：“这种自相矛盾为这样的论点奠定了基础，即不完美信息可能不是例外情况，而有可能是一种规律。”

纵观他的职业生涯，斯蒂格利茨与超过100位合著者撰写了600多篇文章，以至于他的个人简历多达60页。诺贝尔奖得主、《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评价斯蒂格利茨是“一位几近疯狂的伟大经济学家——几乎每次你深入经济学的分支领域时……你都将发现大部分的工作是基于斯蒂格利茨的开创性论文”。

学术论争

1993年，斯蒂格利茨放弃了他在学术界安逸的生活，投身充满纷争的政策世界。他成为克林顿CEA的一员，不久开始担任该委员会的主席。艾伦·布林德是普林斯顿教授和CEA成员，他形容这一举动“对学术界的超级明星而言是颇具勇气的转变”。斯蒂格利茨在推动某几项提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说服多少有些犹豫不决的美国财政部发行通胀指数化政府债券。但乔纳森·凯特在《美国前景》中写道，斯蒂格利茨辩论的风格——即使在关于议题的内部辩论中落败，也要将他的论据公之于众——使他与其他总统顾问（如拉里·萨默斯）的关系急剧恶化。布林德委婉地指出“约瑟夫的行事风格……可能会被认为是有些不切实际的。”

“斯蒂格利茨在推动某几项提案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包括说服多少有些犹豫不决的美国财政部发行通胀指数化政府债券。”

当斯蒂格利茨1997年离开白宫，转而担任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时，他的这种风格愈发明显。他抨击关于转型经济体需向市场和资本主义快速转型的建议。斯蒂格利茨赞成更渐进的转型，理由是在向市场转型之前需要进行法律和制度改革，以支撑市场经济。肯尼斯·罗格夫是哈佛教授和前IMF首席经济学家，他怀疑斯蒂格利茨的方法能否成功。他说：“市场制度不可能在实验室的环境下发展，而且事实上，向市场的转型在开始时无法避免无序的情况。”罗格夫还补充说，因为作为原有制度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已瓦解，“某些新的制度必须尽快产生”，而在这种匆忙的过程中失误不可避免。但是“制度的成熟是一个长期过程，即使今天呈现于世人面前的制度再不完美，也要好于在计划经济体制瓦解时不立即开始进行此种努力”。

在1997—1998年金融危机期间，斯蒂格利茨公开批评了IMF和某些亚洲国家政府共同推进的项目。斯蒂格利茨认为这些国家为保护通货而提高利率的做法适得其反：高利率增加了贷款违约和公司破产，降低了经济体中参与者的信心。不是每个人都同意斯蒂格利茨的观点。最近，MIT的经济学家鲁迪格·多恩布什为高利率策略进行了辩护，他表示该策略对重铸信心

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他还补充说：“没有哪位财长会选择斯蒂格利茨诊所的另类疗法。他们（情愿）被救护车送往IMF。”加州伯克利大学的著名宏观经济学家布拉德福德·德隆曾写下这段话：“斯蒂格利茨所谓的在更少条件下增加贷款，并且让政府通过多发行货币保持低利率的前提……应该极有可能……以超级通胀或大规模的金融危机而告终，因为通货价值的下降消除了每个企业和银行偿付硬（外国）通货债务的能力”。

1999年离开世界银行之后，斯蒂格利茨奔赴哥伦比亚大学，并写了一本名为《全球化及其不满》的畅销书。该书的许多评论者都提到了其叙事的力量，这来自书中明显的反派——IMF。此书共计340次提及IMF——几乎完全是批评性的。Tom Dawson是当时IMF对外关系部的负责人，他曾经打趣说：“该书每页都要不止一次指出所谓的IMF犯的错误。你会认为我们做对几件事情完全是意外。”

“游戏尚未结束”

斯蒂格利茨的确认为IMF在2007—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做出了一些正确决策。他在2009年对《迈阿密先驱报》这样说：“IMF绝对比以前大有进步，它在很多方面作出了改变。我认为每个人都要认识到这一点”。在IMF和世界银行于伊斯坦布尔举行的年会上，斯蒂格利茨赞扬了IMF对全球财政刺激政策的支持，以及其关于过早停止刺激措施将付出高昂代价的观点。他对《华尔街日报》说：“IMF改变了过往的形象。”

斯蒂格利茨看到了金融危机的余波正如何验证他的学术成果和他几十年来在政策圈中的言论。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与他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布鲁斯·格林沃德合作的论文中，斯蒂格利茨描述了金融和信贷条件的改变对商业周期的传播是何等重要。在2007年7月的一次演讲中，美联储主席伯南克提到了斯蒂格利茨等人的成果“给予经济学家用以思考金融市场在实体经济中的中心作用的工具”，并且对“往日正常运转的金融市场的分崩离析……通常会对实体经济有着重要影响”有了进一步的了解。这一论断的情形大萧条时期曾出现过。

在这次演讲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伯南克和全球的决策者就开始对抗本次金融危机，其对经济的威胁足以与大萧条期间所产生的影响相匹敌。危机带来了改革的呼声，包括对银行家的薪酬加以控制，以及加强对衍生品市场的监管。对斯蒂格利茨而言，一项重要的改革应该是恢复1933年颁布的《格拉斯—斯

蒂格尔法案》，该法案拆分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1999年，斯蒂格利茨曾反对撤销该法案，他担心此举将导致2007—2008年这样的金融市场崩溃。“撤销《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令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重新结合，投行文化占据了上风”，斯蒂格利茨曾这样写道。

尽管出现了金融危机，但斯蒂格利茨仍对市场和资本主义的未来持乐观态度。不同于“19世纪所有者掌控的资本主义，21世纪的资本主义将掌控在大众手中”，他这样说。但为了成功实现这一目标，人们必须更加了解经济，并且需要有更多公民参与经济政策的制定。考虑到这些目标，斯蒂格利茨在2000年启动了“政策对话倡议”（IPD）——一个包括经济学家、政治学家和决策者的全球网络，用以研究复杂的经济问题，并向各国提供备选政策。IPD还举办专题研讨会，从而使媒体和民间社会有效参与到政策制定中来。道森高度赞扬这一努力：“这是项艰巨的使命——你几乎得有着像U2乐队主唱波诺那样的政治影响力”。

确实，为了争取到更多听众，斯蒂格利茨还参与拍摄了一部纪录片——《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一起周游世界》。该影片的主题是如何更公平地分享资本主义的果实。这将给制片人迈克尔·摩尔带来金钱吗？“不会”，斯蒂格利茨笑道，“我认为摩尔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但“沮丧不会带来任何好结果”。

不像摩尔，斯蒂格利茨说他本人并未失去他的“美国中西部的乐观主义”，即相信在长期事情会出现转机。他说许多人向他表达了这样的忧虑：在金融危机还未结束之时，银行家和他们的拥护者似乎将重新掌权。但是如果对金融体系的真正改革没有实施，“未来10—15年内再次发生危机的风险就仍然切实存在，而且银行在下一轮危机中获胜的可能性更低”。每次危机都提供了“进一步进行民主改革的动力。游戏尚未结束”。■

Prakash Loungani是IMF研究部的顾问。

参考文献：

- Chait, Jonathan, 1999, “Shoeless Joe Stiglitz,” *The American Prospect*, July 1.
- DeLong, J. Bradford, 2002, “IMF Chief Economist Ken Rogoff Unloads Both Barrels in the Direction of Joe Stiglitz,” *Semi-Daily Journal*, July 2.
- Hirsch, Michael, 2009, “The Most Misunderstood Man in America,” *Newsweek*, July 27.
- Rogoff, Kenneth, 2002, “Has Russia Been on the Right Path?” *Vedomosti*, August 26.
- See bibliography online at www.imf.org/fandd